

4-6612

安 泽 文 史 资 料

第 一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泽县委员会

前 言

在县委领导的关怀下，《安泽文史资料》问世了。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第一辑我们先选编了战争年代曾担任县级领导职务十五位革命先辈的回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最光辉的历史篇章。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安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自己光荣历史的一页。然而，敌人愈凶残，环境愈艰苦，胜利也就愈来之不易，安泽人民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温故而知新，对既往革命历程的回顾，会加深人们对当前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有助于继往开来振兴中华，建设“四化”。为此，我们还将陆续编印其他民主革命时期中层干部以及农村“三老”的回忆录。当然，为了全面反映安泽的历史与社会概貌，我们也要广泛征集、编印其他方面有关安泽的文史资料。

本辑文稿，除邓辰西主任一篇是本人的亲笔回忆外，其余全是编者根据当时的谈话记录整理，因时间仓促又未经谈话人审阅，加之编者水平有限，缺点错误一定在所难免，恳切希望革命先辈与知情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五年十月

安泽县旧政权的改造

邓辰西

邓辰西，原名邓肇祥，临汾县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任安泽县长，对我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开创和奠基作用。这篇回忆刊登于《山西文史资料》第27期

...—△—...

太原失陷以后，为了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战略方针，改造旧政权，建立山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牺盟会的领导机关由交通沿线转移到山区。在改造旧政权和巩固抗日政权方面，同阎锡山、蒋记国民党开展了既联合又斗争的错综复杂的斗争。我这里要谈的只是我在安泽县工作时，亲自参加斗争的片断回忆。

一、从阎锡山的召见谈起

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份，总会决定成立长治中心区，并将晋城中心区与长治中心区合并，管辖长治、屯留、长子、潞城、壶关、平顺、陵川、高平、晋城、阳城、浮山、沁水十二县。十月下旬，总会委派付雨田任长治牺盟会中心区秘书，陈大东任宣传部长，先行到达长治进行筹备工作。我也由晋城调往长治，同付雨田、陈大东二同志商量合并事宜。那时，我任晋城牺盟会中心区组织部长。此时总

会又决定将原属洪区中心区的安泽县划归长治中心区管（当时的安泽县城在洪洞县以东五十华里的晋阳谷上所在地，辖区包括现在除了良马公社的安泽、古县两个县，现在的安泽县政府所在地是那时的第三区公所所在地府城镇）。因安泽是太岳地区的战略要地，傅、陈二同志让我不要再回晋城，暂以长治中心区巡视员的身份，先到安泽县接收和检查工作。为加强安泽县工作，又派韩子琛（女）与我同行，担任县特派员。原任特派员巩绍英（十七岁）职务不动，但工作由韩子琛主要负责。

大约在十一月十一日（或十二日）的下午，突然接到阎锡山发来的一封手谕急电，要我星夜赴临汾（安泽距临汾一百华里）到行营报到。因我从未同阎直接打过交道很觉奇怪，但又不能不去。经同韩子琛、巩绍英同志商量，安排了工作后，立即动身。次日拂晓赶到了临汾阎锡山的行营报到。通知说，阎马上接见，叫我天亮前到土门详谈。接见的这样快，又使我奇怪。为了弄清情况和向党请示，我通过党的临汾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刘舒侠找到了省委书记张友清。友清同志说，情况他不了解，让我到土门后先同牺盟会总会负责人商量。需要同他商议的问题可及时回临汾县城找他或就近到刘村镇请示北方局杨尚昆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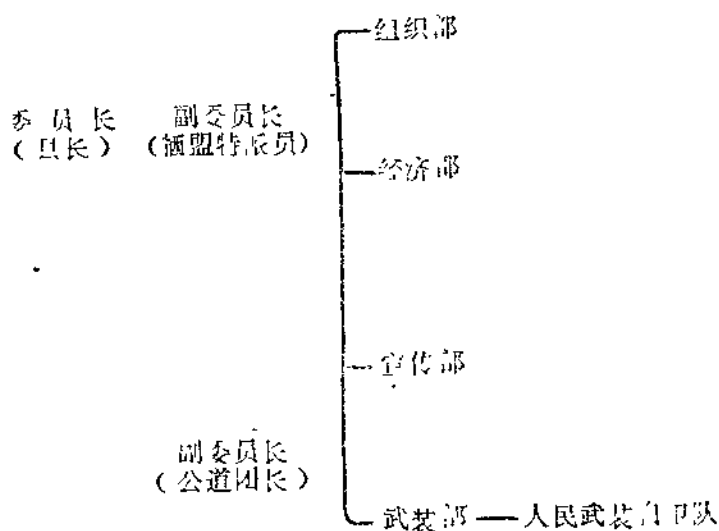
我到土门后，牺盟总会领导人只有刘岱峰同志在。他告诉我，原来是长治专员公署主任兼长治县长续济川（阎锡山同志会的领导人之一）和旧军军长孙楚联名给阎锡山发来一封很长的电报，告长治县牺盟特派员宋乃德的状。阎看了电报非常生气，决定叫长治中心区的领导人回来亲

自处理。刘岱峰同志还对我说，因为你在安泽，来临汾方便，所以叫你来了。其实我对长治的情况也不大了解，只是到长治后，听宋乃德同志简单谈过他同续济川、孙楚的矛盾和斗争情况。我动身去安泽时宋乃德给了我一张续、孙自己印发的各县动员委员会组织系统表，要我到总会又映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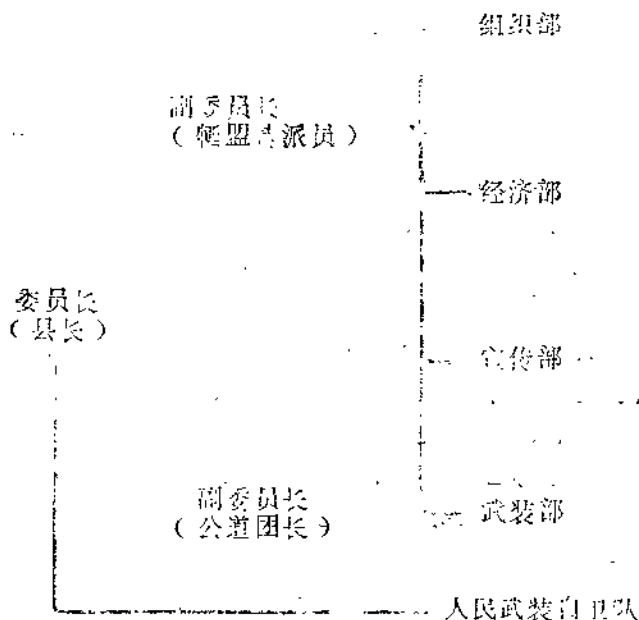
知道了阎锡山叫我到临汾的原因之后，在刘岱峰同志的帮助下，从梁化之（阎锡山的特务头子）那里看到了续济川和孙楚给阎锡山的电报。电文中具体事不大多，骂人的话不少，如说宋乃德“蓬首垢面，不修边幅，俨然非人也”等等。我当即决定抓住这一点和续、孙自己印发的那张动委会系统表去打这场官司。因为梁化之自以为是牺盟会的头头，他同续济川、孙楚又是阎锡山手下的两个派系，两家勾心斗角，非常厉害，所以他也害怕官司打输了对他不利，便主动领我去见阎锡山。

到阎锡山那里，阎锡山很严厉地问我：“宋乃德：什么对续主任、孙军长的态度那么坏？”“你了解宋乃德吗？”听了阎锡山这两句话，我感到问题严重。为了争取主动既不能说了解，也不能说不了解，而且不得不先讲点宋乃德同志的缺点。于是我说：我到长治不久，了解情况不多，宋乃德年轻性急，不懂官场中待人接物的习惯，说话不讲究方式，生活上不讲究修饰，不刮脸，少理发，确实不象个官，续主任、孙军长可能对他有些看不惯的地方，但他抗日积极性高，工作踏实，整天忙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抗日，长治群众都很拥护他。说完有关宋乃德

的这些话后，我没等阎锡山开口，立即以请示的口吻问阎锡山：我对续主任、孙军长有点意见可以讲吗？阎答：“你讲吧。”我说：续主任孙军长对下级随便谩骂的态度也是引起下级不满的原因，如给总司令的电报中，就说宋乃鑫倒戈非人也。阎当即问梁化之电报中是否有这样的话，梁说有。正在这时，续济川、孙楚来了。阎叫他们坐下后又继续问我了解那些情况，我就拿出了续、孙已印发的动员委员会组织系统表递给阎的手中，并说他们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可能在这张表上。原来这张表和阎锡山公开发表的门不一样。阎公开发表的是：



续、孙自己发的表是：



这样，就将人民武装自卫队改成了直属委员长(县长)领导，剥夺了付委员长管武装的权力。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当时估计，这样改不可能是续、孙的主意，可能是阎锡山玩弄的两面派手法。由于这张表暴露了阎锡山的阴谋，所以阎看后十分恼火，大骂续、孙：“你们跟我一辈子，越跟越糊涂了！”阎不停地骂，续、孙站在一旁

不敢吭声。听见阎锡山的中有话，不便久留，我就站起来向阎告辞。梁化之也跟着出来了。

官司打赢了，趁机换掉旧县长

回到牺盟总会，梁化之对我和刘岱峰同志高兴地说：“这场官司算是打赢了！”我接着说：“我觉得，这张表的问题不解决，官司打赢了还不算解决了问题，牺盟会的工作仍然不好开展；而要解决这张表的问题，就必须趁机换掉旧县长。”刘岱峰也同意这个意见，并以晋北沦陷后旧政权全部瓦解的教训提醒梁化之。梁考虑了会儿，表示同意，但说全部撤换，一个不留，怕阎不会同意。言下仍有犹豫。经过刘岱峰同志和我力争，他才叫我提出新任县长名单表。当时我本想先请示一下省委或北方局，刘岱峰提醒我说：“你写吧，你写出名单就到邱仰浚（阎锡山的民政厅长）那里要委任状，此事越快越好。”我也怕夜长梦多，但名单一下子又提不全，就先同梁商定了一条原则：由牺盟特派员任县长，经牺盟会改造过的公道团长任牺盟特派员，公道团长则从牺盟会的积极分子里提拔。并立即提出一个不完全的名单。现在记得的有：王耿人任晋城县长，李敏之任阳城县长，徐明任高平县长，续济川不再担任长治县长，而由宋乃德任长治县长，张厚生任壶关县长，钱任安泽县长（刘岱峰同志提的），其余的想不起来了。记得当时开的名单中没有襄城县，因为曾听宋乃德同志讲襄城县长比较能同牺盟会合作抗日，加上梁化之一再表示不同意全部换掉，所以暂时空下没换。由于当期大敌正

境，日军正准备从东、北两面侵犯山西南部，形势迫使阎锡山第二天上午就批准了上述县长的任命。第三天就拿到了委任状。

拿到委任状，我即赶回临汾，向省委张友清同志作了汇报。友清同志完全同意并很高兴，同时讲了为了全面抗战，必须改造旧政权的道理。我提出请友清同志给配备几名干部，他给我写了封信，叫我去刘付找杨尚昆同志。

我到北方局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杨尚昆同志向我详细地讲了当时的形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改造旧政权等问题，并答应等总部学兵团本期学员毕业后给我派几个人还答应同总部商量给我派几名搞武装工作的干部。

我回到临汾城内，向张友清同志汇报了杨尚昆同志的指示。又经友清同志同意，把在临汾牺盟会工作的共产党员朱剑白同志调到安泽县政府任政府秘书，同我一起到安泽。我又在临汾请了邓子坚、祁果等同志到安泽工作。

以后听说县长的委任状发到长治后，长治中心区又做了部分调整，如王歇人同志到了陵川等。这样，长治地区的县政权基本上由牺盟会掌握了，这对以后领导当地的抗日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当时没有提出潞城县县长的名单，后来被续济川钻了空子，听说续济川不愿意丢掉县长这个实权。他给阎锡山发了一封电报，说潞城县长应换掉，建议宋乃德去，他自己仍担任长治县长。阎锡山同意了。又听说潞城县群众反对旧县长，要求撤换，才派宋乃德同志去的。因我到安泽任县长后，安泽又划归沁县专署领导，所以对长治地区的情况了解就不准确了。

大力改造旧政权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和朱剑白同志正式到安泽县政府接任。接任后，我同朱剑白、韩子琛、巩绍英等同志分析了安泽县当时的形势，确定工作的重点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改造政权，发展抗日武装，实行合理负担。这一时期，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对县政府的科局长逐个进行了调查了解，由朱剑白任教育科长并分管县政府会计。

二、撤换了四个区的区长。调牺盟会积极分子（以后证明是伪装）第一高校校长王庆兰任一科科长。

三、改造了县公道团，将原顽固团长挤走，由邓子坚任团长。

四、组织了人民武装自卫队，队长是总会派来的陈热风，指导员是徐鸿文。又从警察局仓库中拿出三、四十支枪发给了人民武装自卫队。同时，向决死队要了一些子弹和手榴弹。以后又从散兵游勇手中收缴了部分枪支弹药，这样，到一九三八年二月份，人民武装自卫队已发展到有百人以上，且都有枪支武器，并有一挺轻机枪的抗日武装力量。

五、组建了抗日宣传队即文工团。十二月下旬北方局派来了六名总部学兵团毕业的同志，来安泽县参加地方工作。其中关子平到公安局任政治工作员，董光（女）到牺盟会任工作员，邓钟祥、乔书泽（女）、董坚（女）等四同志作为文工团的骨干，同时吸收了当地二十名男女知识

青年，成立了抗日文工团，团长是赵子岳，付团长是祁果。

六、由于武装警察队成分复杂，其成员基本上是杨博生的青帮弟子，改造比较困难。故决定先由县长统一指挥，逐步改造，迫于当时抗日斗争的形势，警察局长杨博生勉强同意了，但实际始终没听我的指挥。从警察局拿出部分枪支给自卫队，也是经过斗争才勉强拿出的。

七、初步实行了合理负担，同顽固地主做了坚决斗争。

八、十二月底，总部派来了红军排级干部周国钧，侯福安二同志。我派周国钧任府城区区干队政治工作人员，侯福安任古县区干队政治工作人员。其它两个区——金堆区和唐城区也分别成立了兵力相当于一个排的区干队。

九、清理义仓、监狱，将能食用的粮食供给军用，释放了一些轻犯，甩掉了战争包袱。

人民的政权不能交给国民党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我和县政训秘书朱剑白同志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八十三师扣押，人民政权被抢夺。这是八十三师预谋的。大约一九三八年二月底，蒋军八十三师（师长刘戡）从沁源进驻到一区区公所在地金堆村，我们才知道，该部队纪律很坏，所到之处，不出手便便要粮，要柴草，要款，抓人，打人，群众到区、县告状的很多。为了同友军搞好关系，我们即派警察局长杨博生去该师联系，征求他们对地方的意见，同时反映军风纪情况。

不久，八十三师派了一个工作团来到安泽县城。团长

姓王，副团长是山西赵城人，（姓名失记）。这个工作团名义上是宣传抗日，实际上进行特务活动。他们先要求成立军政民联合指挥部，企图以此代替县政府，我们坚决不同意。此计不成，他们又要求参加动员委员会，我们表示欢迎，在动委会开会时，请他们参加了。但他们在会上并提不出如何工作的意见，只提出要派人担任副委员长，在每个部派一人担任部长或副部长。到会同志向他们说明动委会的组成人员是阎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的，我们无权随意变更。但他们仍然坚持己见，为此事先后开过三次会。最后他们见此计不成，又表示可以不担任副委员长，但要担任组织部长或武装部长，我们当然也不好同意。这件事表面上就搁起来了。接着他们又提出要粮，要柴、要款。县政府向他们要司令长官行营调拨手续，他们没有，我们向他们解释：阎司令长官明令规定，部队向地方要粮款时，都必须持有司令长官行营的调拨手续，否则一律拒付。这样，工作团同县里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们想要抢夺安泽县抗日政权的阴谋也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了。

三月初的一天下午，西山哨所报告：从下冶村（城北二十里）方向来了约一个连的兵力，在距城五里处成散兵队形向县城前进，但看不清是什么队伍，我们想日军也可能从城西北进攻安泽。于是决定县各机关、团体立即撤出城外。同时动员居民准备出城，并将武装警察队分别部署在东山和北城门上，警察局长和自卫队长暂留在北城门楼上观察动静，见机行事，我则率领县武装自卫队带一挺机枪上了西山。那支部队行至县城约一里的地方，发现

我们有准备，便立即收拢，整队来到北城门口。自卫队长见他们是八十三师的一个连，便问他们有什么任务？为什么要散兵前进？他们心怀鬼胎，答话前后矛盾。先说以为县城被日军占领了，后又说是军事演习。当我们批驳得无话可说时，又说这是误会。在该部连长要求下，自卫队长带他到西山向我解释、道歉。实际上这是八十三师预谋武装夺取县抗日政权的一次试探行动。

三月五日，敌机轰炸安泽城，洪洞之敌也已东进到苏堡镇（苏堡镇是洪洞县东邻安泽的一个镇，距安泽县城三十里）。苏堡镇山上的哨所报告：敌有继续东进之势。我们立即召开会议，决定紧急动员城乡居民转移，县级机关、团体撤至县城东北七里处的张才村。七日，哨所报告：敌已撤回洪洞。县政府和居民便又回到城里。当晚我召集政府、团体负责人开会，研究部署开展游击战和群众撤回城内的善后工作，直到深夜十二点钟以后才散会。我们因过分疲劳，就在会场附近的房子里休息了。

三月八日凌晨，有人打我的房门。我的警卫员田森问清是警察局长杨博生便开了门。门一开，杨博生便带着八十三师的几个武装人员闯了进来，他们首先把田森的枪缴了，又从朱剑白身上抢走了县印和几千元公款。然后杨博生才指着同来的一个军官对我说：“这是八十三师的×团长，他们一定要我领着来找你，我不得已……？”我说：“你用不着解释，你们还想干什么？”那个团长说：“请县长和秘书委屈一下跟我们走一趟”。遂把我和朱剑白带到城里的一个四合院里，由一个连看守起来。

天明后，田森同志找到了关押我们的地方，经过一再交涉，门卫放他进来了。（后来知道当时看守我们的这个连长不满意工作团的作法，对我们看管不严）田森对我们说：八十三师师长刘戡出了一个布告，委任县政府一科长王庆兰为县长。给我加的罪名是“弃城潜逃，违犯国法，疏职查办”。

在我被国民党军队扣押期间，覃应机同志多次探望我，因为他是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参谋，以保卫统一战线为理由来看我，八十三师不敢阻拦。因此，我仍可以了解到外边的情况，也可以把我的情况转报沁县特委（书记安子文）和专署（专员薄一波）。

在关押期间，八十三师看守我们的士兵故作鬼态，制造恐怖气氛，恐吓我们。如在我们窗外悄悄说我们罪名很重呀，要杀头呀，还在院子里朝天放枪。以后经过我们进行工作，士兵们对我们态度才好了一些，看管也就逐渐松了下来。

这次事件斗争的焦点是：我们是否办理县政府移交手续的问题。工作团的团长王某唱白脸，副团长借老乡关系唱红脸，软硬兼施，要我向王庆兰正式办理移交手续。他们说办了移交手续就可以放我们。后来又提出不办移交手续，只写一张简单的移交条子也行。这就可以看出他们急于把抢夺政权的行与合法化的作贼心虚的本质。我便指出他们给我强加的罪名完全是捏造，他们抢夺政权是非法的，坚决不办移交手续，条子也不写。弄得他们毫无办法。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把我们假释了约一周时间，但见

我们仍不办移交就又把我俩关押起来。

到了五月底，他们黔驴技穷，拿出最后一招儿，杨言要把我们交给八十三师的蔡军法官处理，先是扮红脸的工作团副团长来假惺惺地表示为我们担心，说蔡军法官绰号杀人精，如把你交给他处理，恐怕就没命了。接着王庆兰也借探望我的名义来见过我一次，一方面假惺惺向我表示他接受八十三师委任的县长是迫不得已，很对不起我，请我原谅；另一方面（真实的一面）是要求我给办个简单的移交手续。

王庆兰来见我的第二天，县政府承审员王志周来了。过去我对这个人的印象是平淡的，但这次他来看我，却给我帮了忙。他向我透露两天前八十三师蔡军法官曾经找他议论如何处理我的问题。蔡提出我有三条“罪状”，一是携款潜逃；二是放弃阵地；三是反对中央（指不让他们担任动委会领导职务及拒付八十三师粮）。王说他以蒋介石、阎锡山的有关命令反驳了蔡。他这一讲，我心中就更有底了。

两天之后蔡军法官果然来了。也果然提出了我的所谓三条“罪状”，态度极为蛮横。实则色厉内荏。

所谓三条“罪状”毫无根据。我的理由是：

一、三月六日，因洪洞之敌到达苏堡镇，当时分析敌有继续东进之势，县政府才决定转移到张才村。敌人先攻，县长率领全县机关、团体及县城居民转移阵地，当然要带走公款，不带着公款，难道把公款留给敌人不成？这叫什么携款潜逃？

二、蒋介石明令规定，县长的阵地是所辖县的全境，因战争需要可易地办公。我从未离开过安泽县境，而且八十三师是在县城政府院内非法扣捕我的，怎么能说我是“放弃阵地”？

三、阎锡山明令规定，不论什么部队需要地方供给粮秣，都要持有司令长官行营的调拨手续，动委会的人员组成有明令规定。我是执行阎司令长官的命令，根本不是什么反对中央，相反他们非法逮捕阎司令长官委任的县长，抢夺地方政权，才是破坏抗战，反对中央的。

我据理驳斥后，这位军法官理屈词穷，气急败坏地溜走了。从此，他们再未来人找我。

直到五月初，经过薄一波同志和丰佩琮同志找李默庵军长和刘戡交涉，并答应由专署任命王庆兰为安泽县长，我和朱剑白同志才被释放出来，回到专署。一个月以后，薄一波同志又任命张学纯同志为安泽县长，免去了王庆兰的县长职务，调他回专署工作。王自觉心虚，就同杨博生一起逃到洪洞境内的八十三师游击队反动分子张书榜那里去了。

回想起来，刘戡所以敢如此胡作非为，主要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嫡系，有靠山。

这里要补充谈一点：我被国民党军队非法扣押后，县自卫队队长陈热风同志，指导员徐鸿文同志率领一部分队员同牺盟会到和川去了；府城区区干队由周国钧同志率领参加了八路军；古县区区干队由陕晋安同志率领参加了党领导的县游击队。

上述回忆，因时过数十年，手头又没材料，只好根据记忆粗略谈一谈。有关事实、人名、时间、都可能 有错误，也可能有遗漏的。同时，由于自己水平不高，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判断，还可能有错误，请了解情况的同志 指正。

张学纯局长访问记

张学纯，陕西省神木县人。一九三八年六月至四〇年二月任安泽县县长，一九七七年十月我们拜访时，他当时在国家一机部成套局任局长。

…—△—…

安泽是太岳区的前哨阵地，是我们与日本人、国民党、阎锡山旧势力斗争的焦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一九八三年，国民党在安泽驻有重兵，都是从忻口战场退下来的，有八十三师，四十七师，还有十七军和一部分阎锡山的晋绥军。其中搞磨擦比较凶的是刘戡的八十三师。早在三月初，八十三师就寻衅闹事，无理扣押了安泽县的抗日县长邓肇祥（共产党员），派了一个叫王庆兰的国民党员当县长。我们不允许他们胡作非为。王庆兰带一波专员派付珂亭（忻州人）到安泽任县长。付是民主人士，思想靠近我党，派付任职是想缓和一下矛盾。但八十三师拒绝付珂亭进城。付只能在城外一些村工作，困难很